

医 韬

中医药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 郑志国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中医学新论

医 韬

中医药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郑志国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韬：中医药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郑志国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087-1776-0

I. 医... II. 郑... III. 中国医药学—研究 IV. 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5920 号

书 名：医韬：中医药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著 者：郑志国

责任编辑：侯继刚 张英杰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51698 66085586

传真：66051713 邮购：66060275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保定市恒艺印务公司

开 本：185mm×26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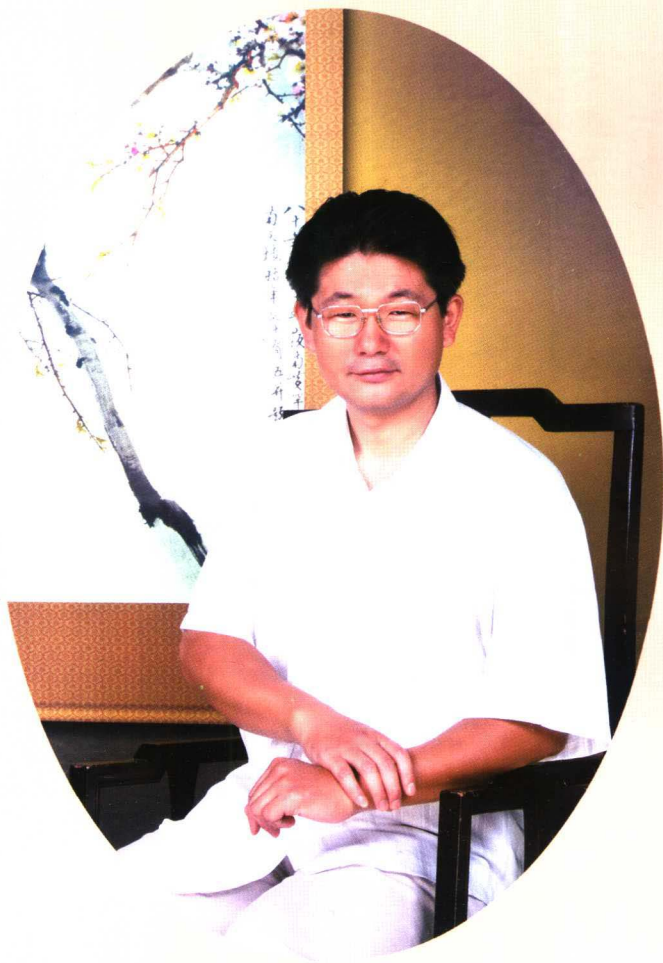
印 张：38.25

字 数：7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0.00 元



作者简介

郑志国，中医主治医师。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医专业毕业。自幼好学，但因病不能完成中学学业，在求医过程中遇到传统中医之良医刘全才医师，身受目睹了传统中医药学的功效。后从刘全才医师研习中医学并继续自学，逐渐认识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真正内涵和在现代社会中无可取代的价值，遂将继承和弘扬传统中医学作为自己的人生之路。

绪 言

本书的写作缘起与目的

本书是一部试图全方位地研究中医药发展问题的学术作品。构思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期，开始书写于 90 年代的后期。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世界文明形态的进步超越以及人们对文明形式多样化的充分肯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奋斗目标和越来越能够亲身感触到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有志于研究发展中医药学的个人，生活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之中，如何能使自己所处的中医药业跟上民族复兴的步伐、摆脱百年之久的颓废、最佳地实现它的社会功能、尽快地汇合于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而不再是社会变迁的牺牲品，渐渐地成为笔者在中医学专业技术研究之外的唯一的私自学术研究科目。当笔者把自己的初步研究心得书写成文字时，随着书写的过程，一步步地发现需要涉及的领域和必须进行论证的条目是近乎惧人地广阔和繁多，好在笔者自少年起即喜游猎百家之学，后又专习于中医一业，虽常感举步维艰，然做学问就应是一种“攀登陡峭的山峰”之类的事情。故而欲将此研究进行到一个有些结果的阶段。

一稿草创，二稿逐渐将研究视野展开，此时，中华民族的复兴已经成为全民族的不争共识。尤其是江泽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明确为全民族的最高战略目标之后，笔者自感所研究的科目已经具有了十万分的充分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故在第三稿中将自己的主要观点无忌惮地分肆成篇，即是本书的内容，算为一个个人对此类问题的阶段性研究结果。

本书内容的形成过程

“阴阳五行”

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发展中医药学以及形成现代化的、能够代表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新兴中医药产业的当务之急是论证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阴阳五行”。查考、翻阅近代以来的反中医药学诸论，其最后落点都集中在一句话上：“阴阳五行是‘玄学’，‘玄学’就是不可知，不可知的就应当抛弃它、反对它、不去知它。”笔者因此就常做这样的思考：如果说“不可知”是不好的，那么什么是“可知”的呢？显然，世间的一切学问，“可知”的，就是别人已经有的了。凡世上未知的、或代表人类最新文明发展方向的、或超越庸常之人思维界限的，都是所谓的“不可知”或暂时的“不可知”，这些“不可知”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的社会，因为自20世纪初以来，只知学习“可知”，而“可知”事实上就是洋人已有的。可见，“不可知”断不可一概封杀，“不可知”即是“未知”的一种贬义的说法，而“未知”正是人世间真正高级的学问发展而知之的正途。

“阴阳五行”是否就真是“不可知”呢？笔者为此做了两个方向的验证：一是浏览那些用来证明“阴阳五行”不可知的证据，从未见到一条是有道理者。“阴阳五行”是中国人的学术范畴，而指其为“不可知”者，几乎净是摹习洋学之人，他们对中国自身的学问，基本态度是疑之、毁之、埋之、掘之。这些人的学术思想是“阴阳五行”这类中国原有学术的死对头，又怎能成为判断学术合理与否的证据？相反，倒发现不少证据是证明“阴阳五行”是可知的，如辩证法的二分法，就证明了“阴阳”的可知性；而欧美的洋人是既重视“可知”又更追求“未知”的社会群体。他们认为“五行”是一种甚有价值、包含了某些奥秘的学术范畴。文字、理论上的验证否定了“阴阳五行”不可知，亲身实践之，又当如何呢？笔者在近十年间不务世间他业，但求一温一饱而专习于中医，习其理论、行其技术，所得结论是：“阴阳五行”不是不可知，而是不易知。“阴阳五行”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又是比之更加庞大的中华文明体系的一个局部。中国原有学术的方方面面、各门各派事实上都是盘根错节地连为一体的——文中有武、武中有文、儒中有

道、道中有儒、医中有百家、百家中有医学，认识局部需要同时认识整体，因此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阴阳五行”是不易知的。例如中医界的某些人也对“阴阳五行”半信半疑，那是因为他们的医学理论和技术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真正认识“阴阳五行”的阶段。而这种认识水平的人不断地增多并占中医界的大多数，决定了当代中医学的半死不活状态。

如何去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运用“阴阳五行”及中医药学整个的理论体系？显然应当是在保持中医药学临床实践的基础上，通读中医药学的一切经典文献和现代的相关研究，最后的焦点又必然会落在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的全面领会和深入研究之上。因为《内经》是整个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根本，是最全面精确地阐述中医药学中的“阴阳五行”内涵的经典文献。但《内经》的内容只是中医药学对“阴阳五行”集大成式的运用成果的文字表述，却没有记载“阴阳五行”本身发生、发展以及在医药学领域的发展、运用的过程。在写作《内经》的时代，“阴阳五行”作为真理，如此写作《内经》是充分恰当的；而在现代社会把“阴阳五行”作为“玄学”的时代，研究《内经》若只研究《内经》本身的记载，显然学问只做了一半、甚至是一小半。要把学问做全，就必须在研究《内经》记载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内经》产生和形成的过程、“阴阳五行”本身的发生发展和学术内涵的实质，才能真正地认识《内经》和正确地理解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合理性。

“阴阳五行”从其产生，至《内经》中的庞大理论体系，其间经过了多长的历史阶段和文明征程？《内经》的医药学理论和技术从其萌芽至《内经》的经典内容，又需要多长时间的文明积累？与《内经》同历史区间的《道德经》、《孙子兵法》等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它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什么样的具体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通盘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产生、发展、变化的源流史，就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的文明体系。而 20 世纪的流行史学往往是半截的中国史——只把诸子百家形成经典著作的时代看成是中国信史的起头，并且充斥了对诸经的贬抑理念，因此是一种不尊重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并且同时决定它们也是不值得尊重的“历史”。这样，研究诸子百家经典著作以前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历程，只能在学习诸经的基础上，以《中国通史》之类的记载为参考而不是指导，参酌新中国的考古成就（如大型丛书《中华文明史》），再旁参以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古代文明记载，以开创、探索的态度来进行。

《中华文明史》是一部以考古事实为主要记载内容的大型学术丛书，其中对中国古代“明堂”的学术讨论，启发了笔者对胸中长达10年的一个学术谜团的解决：笔者自习医之初始，就感到针灸学的《人身经络穴位图》中，其处于胸部的众穴名是描绘着一种建筑的形态，但具体是什么，当时无从得知。《中华文明史》中的“明堂”的讨论引发了笔者对《史记》中相关记载的研究，结合《史记》的记载，笔者确定《人身经络穴位图》中处于人身胸骨中线上的穴名所描绘的正是“明堂”。又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笔者确定《人身经络穴位图》的胸腹正面就是一张以“明堂”、“殷（阴）都”为核心的殷商帝国的《天下一统图》，《天下一统图》（以下简称《图》）的形成时代是商周交替之际。

从这张《图》的产生到《内经》成书的战国时代，以此《图》所反映的医学水平为起点，经过西周、东周、春秋几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文明的蓬勃发展，正可形成《内经》的学术内容。这张《图》所反映的殷商帝国的“天下一统”之态，结合我国考古学对商代的文物、文字、文化、社会制度的诸研究揭示，结合《论语》、《春秋·三传》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知殷商不是近代一些学者们所称的一个似乎局部的“王朝”，而是一个统治整个神州大地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并不是殷商势力从无到有地建立的，是从夏朝接受来的。夏朝也不是这个帝国的建立者，它也是从前边的历史中接受的。夏朝所接受的帝国，具体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否曾有这样的帝国？她能否得到历史文献的佐证？她能否得到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即中国之外的其他文明的旁证？她的存在能否得到现代式的理论论证或现代已有的一切理论都不能论证她不存在？翻阅《世界通史》，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存在正是她可以存在的旁证。中国一切古代文献的、从无间断地、广泛普遍地记载都明确指出了她的存在。现代的一切理论都不能否定她的存在。如果中国存在着一个最早的帝国——神州原始帝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源头。结合《书经》的记载，研究原始帝国的文明形态，结合考古学的某些发现和推论，研究原始帝国的产生、发展、形成过程，就可以为中医药学理论、“阴阳五行”的起源提供历史的支点。再以原始帝国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标志物，参以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人类自其产生以来的已知的生产生活史知识，就为全面通盘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文明体系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中医药学的相关过程铺垫了道路。

笔者以自己对中国原有学术尚属极其浮浅的认识而认为，研究中国本身任何学术的源流，都不能绕开中国国家形态最早产生的历史阶段——神州原始帝国阶段。《书经》的《洪范》篇显示，至商代末期，“五行”理论已经发展成了

一个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性质的庞大理论体系；而《甘誓》篇记载，“五行”是夏朝以前就存在的、当时中国人都认可的天道、真理。这两篇《书经》的记载提示：五行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学术内涵的实质应当去原始帝国及其以前的历史时空中探求。那么，首先论证“神州原始帝国”历史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就成为研究“五行”理论的关键。

如何逻辑严密地论证神州原始帝国的客观实在性？以人民之共识？近代以前的、自夏商周以来的所有中华民族的成员，都是确认这个帝国的存在的，甚至近代之前的朝鲜和日本，也都自古相传着这种确认，但近代之后的中国学术主流群体，却认定这所有的确认都不算数。请看领袖们的判断：孙中山是承认原始帝国的存在的，因为他相信尧舜禹的伟大。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公开地、郑重地、面向全中国及全世界地表述：“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根据这些“可考的文字”，它们的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记载原始帝国的内容，可以说，毛主席也是承认原始帝国的存在的。以世界级的学术大师的预断？如黑格尔就认为人类文明的源头应从中国寻找，因为他是西方哲学的超级大师，他或许感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可以为西方的史学提供最有价值的借鉴。但黑格尔的学问有点过头了，对于中国社会中的只要“可知”的群体来说，他也应算是具有“玄学”特征的学者，因此中国的学者们大多不买他的账。以考古发掘出的文物、遗址、遗迹来证明？原始帝国的一切物质和文化的遗产都传给了夏商周，并且尧舜禹这些原始帝国的帝君，把搞那些可以被我们挖掘出来而断定其就是“某某朝代的特征”的豪华建筑、奢侈设施的事情，看成是人间最大的罪恶，他们的帝政就是发展全社会的文明和改善提高所有人民的生产生活，他们为当时的人民创造了最大的幸福，却最不利于现代的考古事业。

存在于距今 4000 年之前的神州原始帝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方法都无法证明。笔者因此使用一种复杂的证明方法，即用现代的中国社会、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整个历史、用中国社会中各种物质和精神，自古以来的传承和发展变化。具体形式是：先根据历史文献、考古成果的推论等，提出一个神州原始帝国产生、发展、变化的文字表述形式，如果这个文字表述能够：

- （一）为 4000 年来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提供起点；
- （二）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产生提供历史依据；
- （三）为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提供源头；
- （四）为中国社会制度的沿承与变革提供最原始的初创形态；

(五) 在中国 4000 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展现出的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在原始帝国时代已具有了萌芽；

(六) 最重要的是，决定原始帝国形成的规则，一直延续在其后的中国社会中，并且是决定中国社会变化、变革的最主要规则，直至今日的中国社会还在这个规则的制约之中。

如果对原始帝国的文字表述具有以上诸条的特征，那么就可以说由这个文字表述所描绘的原始帝国是在历史中客观存在的。因此，笔者本书的《中华本体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论证神州原始帝国的客观实在性。

有了神州原始帝国的客观实在性的证明，“五行”的研究也就得到了坚实的历史支点。

“阴阳五行”中的“阴阳”，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阴和阳，而是包含着“阴阳”和“三分阴阳”两个学术系统。笔者通过对《内经》、《易经》的相关内容的研究，发现这两个系统都源于伏羲老祖的八卦符号，并且是两个具有内在本质联系的、具有高低差别的系统。

在研究了远古时代的“阴阳五行”的实质内涵之后，必须从哲学的角度、人类思维的最高规则或思维运作工具系统的角度，对“阴阳五行”进行一个阐述。这种阐述应当说是需要费些脑力的，苦思之中，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人类哲学界屈指可数的思维巨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辩证法最精确、最透彻的两句概括：“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为笔者的思索开启了明灯：恩格斯的概括正是辩证法的真谛，中国“阴阳五行”的实质正与这伟大的概括完全吻合！笔者由此书写成本书《华夏民族的辩证法》前四小节的内容。后面两小节，以前四小节对“阴阳五行”学术内涵的哲学概括为基础，以“阴阳五行”是高级的哲学理论和人们应当正确认识的真理（或包含真理内核的理论）为学术起点，研究《内经》中的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体系是如何以“阴阳五行”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也就论证了《内经》中的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合理性。

《内经》

《内经》是自两汉以来的中医学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但自汉末至清代，《内经》的学术研究有行内与行外之别。行外的学术研究或许是由唐代学者孔颖达注“三坟”的具体所指引起，宋代的知识界针对孔颖达认为“三坟”是指上古时代的三皇之书，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之类，展开了有关《内经》是什么时代的著作的讨论。其中应以理学宗师二程兄弟（程颢、程颐）的见解较为率直透达。二程兄弟作为理学的宗师，对儒学的“五经”，以其言论而言，并不精到，其特长在于讲求人、学合一，性、理双修，故其出言率达而不惮人诟，唯其如此，其对非其本业的事物的判断，更能反映真实的学术水平（当然二程兄弟的整体学术水平在中国唐宋以来的封建社会中应是属于一流的）。故其对《内经》成书年代的判断是医学行业之外的学术群体中最有价值的。而中医行业之内对《内经》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领会、运用《内经》的经典学术内容上。对其成书年代的认识，自汉末的医圣张仲景至清代诸医家，都不把这个问题看做是一个应当讨论的问题。原因是：如果人们认识到了《内经》医学内容的实质，如此庞大的理论体系，如此精深的学术内涵，如此广泛的医学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把它指定为某一历史瞬间、某一个人或学术团体的文化作品，简直就是一种思维的荒谬。因此中医行业自古就把它挂在中华民族的一切文明成就的总代表——轩辕黄帝的名下，认为非轩辕黄帝不能承载像《内经》这样的医学经典。事实上，《内经》是中华民族在其成书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医药学智慧的结晶”，但中国在近代以前还没有“民族智慧的结晶”之类的概念，只能将其与中华民族的总代表联系在一起。

近代以来有关《内经》的讨论，已经没有了行内与行外的差别。原因是中国的原有文明体系崩溃了，这个体系中的医药学尖端学术群体也不复存在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新文明体系的诞生，中医学的高端学术研究也在缓缓地发展之中。20世纪的中医学是在西洋文明的围困中发展的，因此在研究自己本身的学术重点的同时，还必须研究行业之外的人们关注的问题。这样，《内经》的成书时代问题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内经》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甚至有时“热”到了比研究《内经》本身的经典内容还热的程度。其实，做学问的行内、行外之分是个很狭隘的认识，只要学问做得足够大，任何学术都是行内问题。《内经》的成书时代问题在其不构成对医药学研究的重大影响时是行

外关注或有兴趣的问题，而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以及现代的学术研究视野中，它本身已成为中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任何学术著作的具体内容与它的成书时代是有绝对密切的关联的。

笔者感到，当代中国的中医药学研究，在《内经》的成书时代问题上，中医业自身并没有内行的优势。并且以《内经》的具体内容来判断《内经》的成书时代，就如同用一辆奔驰着的火车上的东西来判断火车的位置一样，是一件不甚容易的事，当然，如果火车上装有里程仪器，又当别论。因此，笔者除了就《内经》而论《内经》之外，还使用判断位置中常用的“参照物法”。具体是：前有对《经络穴位图》形成年代的论证，即本书《经络穴位图中的秘密》一节的内容，后有对《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的医学内容的解读，即本书《解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一节。看看《史记》的这篇有关医学的记载到底是记载了些什么，它的医学内容与《内经》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在解读之后，《内经》的成书时代问题，应当说基本可以清楚了——《仓公传》中的医学必须以《内经》、《难经》为其存在的基础。

《难经》

《内经》的主要学术疑点问题解决了，《难经》的学术研究也就容易明了了，因为《难经》是在中医学发展史中紧承《内经》之后的。笔者对《难经》的学术内容进行研究之后，确认：《难经》在中医药学发展中的决定性贡献是脉诊的“独取寸口”。而且，《难经》的学术内容对中医药学也造成了不利影响，甚至流毒两千余年，这一点需要中医界的同行们来共同研讨。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晋唐以来中医药学学术研究的核心，唐宋以来，研究《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医家千百计，成名者代有其人。笔者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倾向是：凡前贤、时贤所研究的问题，一概不作为研究的重点。原因是：凡能在几千年的华夏社会中成名的贤人，皆是经过历史浪涛淘洗而出的沙中真金，真金的光芒——他的学术成果，常人是很难超越的；另外，前贤是为学术而学术，笔者却想以学术而兴医业，研究目的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方向的区别。因此，别人研究《伤寒杂病论》是研究《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本身，笔者

研究《伤寒杂病论》是在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研究《伤寒杂病论》是如何在历史中产生的？它产生之后，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要想研究《伤寒杂病论》的如何产生，就必须将《内经》、《难经》、《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神农本草经》的学术搞个明了，参以《汉书》的相关医药学的记载，在具有了对《伤寒杂病论》产生之前的中医药学发展趋势的基本明了的认识判断之下，结合《伤寒杂病论》本身的学术内容、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其产生的内在必然性也就容易认识了。

笔者研究了唐宋以来的中医药学主要名家的医学著作和学术思想之后，认为：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中医药学发展和学术研究，是以围绕《伤寒杂病论》的学术内容为主轴而展开的。无论是金元四大家，还是明清以来的经方派与时方派、伤寒派与温病派，其发展变化的轴线都是《伤寒杂病论》的学术。甚至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医药学内治技术体系的研究，要想向专业化、标准化的高级学术方向发展，还需要继续这条轴线，并且似乎已经在向这条轴线靠拢了。这种纯属笔者个人的主观判断，能否得到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证，笔者本书的《神州世界的中医药之河》一节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观点的回答。

针灸学

针灸学是中医学可以存在的最重要支柱。据说，在旧中国，针灸学的医生曾不被社会认可为“医生”而被看做是“针灸匠”。新中国又使针灸学恢复了它的本来角色，但现在还没有赶上中医内治技术体系的发展之势。而在欧美社会，其对针灸学与中医内治技术体系两者价值的认识或许与我们正好相反，他们往往先认识了针灸学，才知道了中医药学。因此，笔者认为针灸学是中医药学在21世纪人类新的文明发展势态之下，能够从中华民族的医药学发展成全人类的医药学的重要学术支柱。对其进行深入的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其产生、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对其将来的发展前景的预判是有益的。

《内经》原文揭示，《内经》时代的中医药学整个体系中的学术主角是针灸学以及以针灸学为代表的中医外治法技术体系。以《内经》为起点，研究其后2000多年的中医药学发展状况，可以发现针灸学的原主角位置被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中医内治法技术体系取代了。针灸学从主角变成了配角，那么，它到底是主角时代的学术水平高还是它变为配角以后的学术水平高？事实上，以笔者所见的现代学术研究，似乎时贤们还没有有关针灸学的“主角”与“配

角”的分别，也没有中医药学体系本身的“内治法技术体系”与“外治法技术体系”的分别。没有这些中医史学研究中最基本的概念，这种史学研究也只能是正处于收集资料的阶段。因此，针灸学的主角与配角谁高谁低的讨论，只能由笔者暂时独自地进行了——即本书《针道溯源》一节。需要自白的是，笔者之所以敢进行这种讨论，是因为笔者自感发现了《人身经络穴位图》中的“秘密”。

笔者在《针道溯源》中所进行的研究的背后真正意图是：针灸学所追求的应是“医道”而不只是“医术”，得“道”的针灸学才能永葆青春的活力。

脉学

脉学是中医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争论焦点之一。这是中医学中的一个纯专业的学术领域。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诸唯洋文人对其虚辞妄语式的指责，自可不必理会，而中医业本身就存在着一批不相信脉学、甚至反对脉学的鲁莽者。因此，将中医药学术体系中的脉学，依经据典而整理之，使其源流竟然、黑白分明，使鲁莽者观之而不再鲁莽、嘲笑者见后而自知失理，且对脉学的研究者们有所启迪裨益，是笔者写作《脉学源流述评与衷中参西》一节的根本目的。

解决脉学自身的学术纷争的关键是“遍诊法脉学”与“独诊法脉学”这两个脉学体系的明确分判。这种分判产生于对《内经》所记载的脉学内容的历史主义的辩证研究。而笔者研究《内经》，所使用的哲学根据是“人的正确思想是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一段毛泽东主席的教导，首先确定《内经》是客观存在，是人类的正确思想，然后就知道了它是中国社会在其成书以前的几千年间的医学实践的结晶，最后就能分辨出《内经》所记载的脉学内容是脉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容的总汇。

《脉学衷中参西》的内容，是笔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来诠释、发展中医学的一种尝试，或许西医界（国内或国外的）的同仁，比我们本行业的还要感兴趣。但笔者的首要目的是论证中医学的合理性，因此希望和中西两界、甚至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展开有关脉学的公平、科学、有益中医药学发展的学术讨论。

中药学

笔者发现,中国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着一种“近代史前的中、西医学经过了基本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处于基本相同的学术水平”的“医药学史观”。由这个史观,中医药学向前发展的道路和终点自然就是“现代医学”。根据笔者所认识的中医药学及笔者所知的西医学发展史知识,这个史观不是无意的以讹传讹,就是有意的痴人说梦或不懂装懂式的学术欺骗!看看中、西两种医学真正的历史,看看现今可以看到的中、西医学的实际内涵,西洋医药学是随着近代大工业、随着化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代人所说的中医药学却还是近代史以前的医药学内涵,中医药学在近代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发展,西医药学在近代以前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两种医学在近代史以前的发展史哪有丝毫的“基本相同”?

这种史观的中医学方面的形成根源,是中国人、中医学界的史学“学者”,在学习西医学的学科建制、教育模式时,借鉴人家的“模式”时连人家的具体内容也一块“借鉴”了,结果把自己本身变成了人家的学术奴隶。这种史观的西医学方面的形成根源是,为了消灭中医药学,就要从历史的源头上消灭——把中医药学指认为自己的低级阶段的类似物,一旦中医药学接受了这种“指认”,那么它也就基本被消灭或征服了。

笔者认为,中、西医药学是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各自医药文明,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药学,由于20世纪的消灭中医药运动中有“灭医存药”这一流毒百年的狠招,更应使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医药业自身全面的认识“什么是中药学”。否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改造中药学、中药西制西用的“医药科学潮流”,会彻底(或终将)毁灭中医药学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很显然,一部机器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限之内,全部地消灭中华大地的所有野生麻黄;几部机器就足以消除中国境内大部分高效野生药材的客观存在。没有了中药或优质高效的中药,国家宪法中的发展中医药业的条文自然就需要做根本性的“修改”——中医药业的竞争对手在中国终于消灭了中医药业。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客观又辩证地认识中药学,是发展中药业的一个思想前提。

笔者把自己对中药学发展史的认识写成一篇论文,即《中药身份的四次嬗变》,是想让人们看看,中药学的史学内涵是些什么内容,哪些是和西药学共有

的，哪些根本不同？

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

笔者在此所指就是中药业。中药是物质的一个种类，但之所以称为“中药”，并非因为它们是草木金石之一种，而是因为它们是中医药在现实中的物质存在形式的主要代表者。中医、中药二者不可分离，“医”是医理，“药”是与这个医理对应的物质。但这个与“中医”不可分离的物质，却被它的竞争对手“相中”了。对手们要把中药拉进自己的队伍之中，理由是为了“科学”和“发展”。而到底是中药与中医在一起更科学、更具有发展前途，还是混进西医药的队伍中为好呢？在人们只知道物理、化学就是“科学”的唯一代表的时代，也许勉强地向西医药的范畴中混，有点“科学”的意味；而在现今的人类科学意识之下，中药作为中医药的一部分，远比混进西医药范畴中更科学。20 世纪的中药向西医药范畴的“发展”，至今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前途，而在中医药自身之内的发展，其前途远景又如何呢？

笔者感悟现代各种世界性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德之机械制造与汽车业、意之服装业、法之香水业、荷兰之花卉业、瑞士之钟表业等等，诸国皆有足以名世之产业。甚至“小国寡民”之国都可以因某一产业而领人类文明创造之风骚，而我们中国——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有什么产业能够领先世界呢？今日中国的所有主流产业，哪一样不是欧美已有并得其先机、获其首利呢？我们只在别人已经耕作收获的土地之中跟随“刨食”，我们的民族能够复兴吗？我们为什么不耕作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田地”而只知唯他人之“文明马首”是瞻，这样的发展是全人类意义上的“文明竞赛”吗？这样的只知随“世界潮流”而不能也不想主导潮流地“发展”下去，几十年后的中华民族还能拥有她的球籍吗？从世界产业大格局的全面合理化、人类文明发展的丰富多样的角度来看中药产业，其对中华民族复兴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值得进行深入地研究的。

笔者由此去了解欧洲诸国的产业发展史，从一本《欧洲经济史》中，看到了英国产业革命是由棉纺业引发的产业链而形成的记载。笔者认为中药业也可形成产业链。并且笔者由“产业链”这一概念进而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就是一个由无数的产业环套在一起的“产业链堆集体”，只要能够拉出其中的某一个产业环，这个产业环所牵带形成的产业链就可以足够长，完全可能对整个社

会的发展造成重大而深刻的推动。因此笔者在本书《产业的崛起》一节中的研究，就是以“如果中药业能够发展成一个新兴的、国际化的产业，其对中国社会能够造成多大的推动作用”为论题而展开的。相信中药业的同仁、国内的产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者、甚至国家的战略决策者，阅之或可有些启发。

中医药业的教育

笔者产生了“建立世界性的中药产业”的理念，其对中医药的研究兴趣也就不再局囿于专业技术和理论的层面。显然，“世界性的中药产业”必须以“世界性的中医业”为配套，而我国现今的中医业，连在国内的生存都已是迫切问题。“误”在何处？“毁”于何害？又如何兴之？除了整个社会在 20 世纪的文明发展导向方面的问题之外，中医药业自身的症结问题又有哪些？中医药业自身的症结问题除了专业技术和理论方面，其整体宏观层面有无致命性的失误？笔者以自己的学习过程为例分析，感觉单纯学习已有的大学教材，并不足以成为一个中医医生，其对自己本民族的文明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信仰和知识了解，现今的大学教育充其量只能教出一种“口头上的中医”——且到了真正需要“口头表述”的时候，口头能力又显出极端的不济。

在现代的社会中，教育体系如同是陶铸产品的模型，有什么样的教育模型，就会陶冶出什么样的教育产品。当然，这种“教育模型”又有学院之内与学院之外的分别，此处只以学院教育为喻。中医业的整个行业的垮塌与教育产品的不实用，其教育体系——产品陶铸模型的缺陷应是关键。笔者针对这种缺陷以及如何修补这种缺陷，在《服务职能的拓延》一节中进行了初步的学术探讨。

中医药业的国家层面的宏观管理

如果有了合格的教育产品，而这种产品却在社会中没有生存的条件或较为合理的生存条件，这种行业能够发展吗？反过来，如果社会原本就有较合理的发展条件，其教育模型却生产不出合格的教育产品，这种教育模型能够不迅速地完善自己而去适应社会吗？如果这样思考问题，可以认为：中国社会中的任何行业的停滞、失落与垮败，都是国家宏观产业管理政策的根本失误。因为行业的社会生存条件是由国家行业宏观管理政策决定的。但宏观管理政策失误有人为性与社会性、可察性与暂时不可察性之别。笔者研究中医药业的发展问题，